

我们街头的城雕,现在已经不少,完好无损有之,残破不已也有之。说起这件事,人们总会想起那个“打电话的女孩”,窃窕少女,被偷走三次,每每“此地空余电话亭”,引出无限唏嘘。然而令我最惊心的,却是一座雕塑——那是夏衍先生的塑像,既没有被“偷走”其身,也没有其他的损坏,只是先生手中紧握的笔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空手的文学大家,在寒风凛冽中尴尬地孤立着……

为什么会“一笔惊心”呢?因为夏衍手中这支笔,50年前也被夺走过——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学大家,夏衍紧握这支笔,写下过百万字的剧本和小说,然而在那场浩劫山雨欲来之时,夏衍就被投入监所,那里除了写交代,没有一个字的文学可言。70年代中叶,夏衍出了秦城,饭是有一碗吃了,叫做“给出路”,但是能写一个字么?不能,手中依然无笔,一个文学家,就这样空手十年。直到云开日出那一天,夏衍感慨地说,什么苦都可以忍受,最可怕的,是夺走你手中的笔。夏衍还说到,造反派打

刘诗昆,不打别处,专打他用来弹琴的那十个手指……
从夏衍手中这支笔,于是想到了另一支笔——1950年9月15日,音乐家王莘到了一次北京,因为感动于新中国天空的晴朗,动情于孩子们胸前红领巾的鲜艳,在从

“一笔惊心”

司马心

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王莘一路高吟,挥笔写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的歌词,这就是后来唱遍大江南北的《歌唱祖国》。王莘在火车上写总谱,用的是一支活动铅笔,而这支笔,又是洗星海亲手送给他的——王莘离开延安上前线,洗星海对他来说,这支笔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写《黄河大合唱》,用的就是它。现在送给你,你们要把歌声带到战场上去,带到人民大众中去。

王莘用洗星海的笔写出了时代的歌,然而这支笔却没有逃过厄运——“大革文化命”之始,红卫兵

抄王莘的家,抢文物、烧乐谱,眼看就要洗劫一空。为了保住这支笔,王莘夫人将它与《歌唱祖国》的总谱原稿一起,埋在后院的煤堆里,直到十年浩劫结束,才重见天日,总算没有付之一炬——然而笔是保住了,但整整十年,它写过一个字没有?整整十年,人民的音乐家王莘,竟然没有拿起过笔,没有写过一个音符。这支躺在煤堆里的笔,对于他又有何用呢?

还是回到夏衍手中的笔。“偷走”这支笔,或许只是一种今人的恶作剧,更或许只是出于一种“无知”,不知道手中这支笔,对于夏衍们、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性命交关的东西,所以不必惊心,不必想得太多——然而我仍以为,这种“无知”,这种对于“笔”的不敬乃至对于文化的恶作剧,似乎仍然值得我们当心——当年夺走夏衍之笔的造反派以及逼着王莘把笔埋在煤堆里十年之久的“小将”们,难道不也是出于另一种深深的“无知”吗?

让我们珍惜这百花齐放的时代,再也不要让夏衍们失去手中的笔。

清晨,从温哥华出发,沿着一号公路向北,我们放眼卑诗省牧场,盘桓苏沙河谷,攀援斯蒂文山脉;我们脚踏阿塔斯卡冰川,听冰河在下面喘喘暗流,登高远眺哥伦比亚冰原,看冰层沿着落基山斜坡楔入湖中;我们坐在露意诗湖畔肆意盎然,深邃而碧净的湖水让我们超凡脱俗,面对皑皑的维多利亚雪山,她似一群飘逸的仙女,从蓝天幽然走下,让我们堕入梦幻……

壮游落基山,对于我的艺术创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三年前,我曾从飞机上俯视落基山脉而引发奇想:这眼下的千山万水不正是最佳的原创山水范本,山水画创新何不引进落基山元素,以开掘我们新的视觉,新的技法,使之更具张力,自由和个性,于是我决定进一步深入实地去体验,从而有了这一次落基山之行。

走进落基山近距离观察,丰沛的植被覆盖山体,往上逐渐稀疏,凸现出斧劈刀削的坚硬岩石,山巅被千年积雪所覆盖。这壮阔的亘古荒原,如用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法来表现,显然是无法胜任。大自然的生命是阳光给予的,落基山的无穷魅力更在于光的普照,描绘大自然的山水画,当然无法忽略光的存在。因而山水画创作,有别于西洋画,而适度地运用光,表现应该是探索的新技法之一。当晴空万里,阳光照射山峦,投下了深深的阴影,这阴影劲道地勾勒出山形和结构,正适合用浓墨大笔挥写。当天空阴暗时,天际濛濛的灰色衬托山巅晶亮的雪峰,这种光感用留白表达最为恰当。更重要的是大自然的光和影,它们流动变幻出新的意境,这就给我们展开想象和自由构图提供了无限空间,最大限度地开辟了创造性的艺术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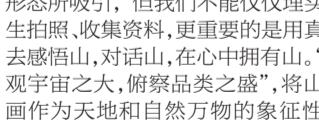
落基山绚丽多彩,由于纬度、季节不同,森林、草原、山谷、溪流、湖泊、冰川每种自然形态都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当代山水画家们面对如此胜境,岂能受制于传统理论的“墨分五色”而忽视视觉的真实?我们不应该拒绝彩色,而是应努力探索彩色在中国画中的独特运用,探索墨与色的融合。中国画在彩色上的创新,没有现成的范本,只有从自然中去吸收蜕变,而不必在乎画种的限制。

走进落基山,我们被大自然生动的细节,丰富的形态所吸引,但我们不能仅仅埋头写生拍照、收集资料,更重要的是用真情去感悟山,对话山,在心中拥有山。“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将山水画作为天地和自然万物的象征性表达,作为与天地和精神

往来。落基山脉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超越,对生命恒久的延续,已突破了山的一般概念,而代表着生生不息的苍穹万类。它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气象万千的生态原型,更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凭借。也许这样思考我们才能摆脱对自然的简单摹写,才能拥有更开阔的视角,放纵想象与激情,突破旧窠创新技法,整体、自由、融合地书写挥洒。艺术由此而升华。

落基山探艺

张复兴



契诃夫的小说《一家商号的历史》,描述了一家书店发展成一个大型商铺的故事。营销学家们可能会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成功案例,我读来却觉得别有意味。
商铺老板西多罗夫开始似乎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痛心于小城陷在愚昧和偏见中,停滞不前;他不愿意看到年轻人没有理想,丈夫打老婆,猪满街跑;他认为必须要做些什么,给这个小城注入思想。
于是他开了小城里唯一的一家书店。他坐在柜台后读深奥的书;他努力按正直的方式思考,赶走“吃鲱鱼粥”这样的“庸

俗思想”;他对闯入商店买醋的姑娘鄙夷不屑,嘲讽她“走错了门”。但是书店三个星期都没有顾客,第一位顾客询问的是没有石笔卖,促使他决定兼卖各种文具。随着顾客要求的增多,他的货品越来越丰富,最后书店成了一家大型商铺。他还开起了酒馆,据说还要接着开浴室。那些曾让他引以为豪、鄙视俗人的书,却早已被低价处理掉了。
小说结尾处,老板的旧日朋友们与他谈起文学,谈起进步,他

可想,母亲是带着怎样的牵挂撒手而去的。此后的日子里,父亲一个人靠他每月50多元的工资支撑着这个6口之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终于有了一次长一级工资的机会,单位一位同事劝他,不要长这一级,现在国家每月给你家的困难补助比这一级工资要多,你长了工资,补助就可能申请不下来了。

父亲很是感激,于是把指标“让”给了这位“好心人”。其实,涨工资是长久的,而“困难补助”是暂时的。多少年后,我们和他“理论”起这事儿,父亲却执拗地认为人家是好心,并教训我们道:“多记着点人家的好!”

我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后,家境明显好转,可这时的父亲已经病倒在床了。记得父亲做完手术后要出院了,那时我叫辆出租车是件难事,我找到我供职的报社车队,想要辆车接老人出院。总编辑王立行准备外出开会来这里坐车,他听到了马上说:“你上我的车,我半道下来去开会,你们去医院接老人。”就这样,父亲第一次坐小卧车回家。当他知道,这是报社领导用的车时,一再要我谢谢人家。下次见面又问,“谢过人家了?”这就是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欣慰、带着满足离开我们的——因为他的五个儿女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那年,我们刚给他办过80大寿,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还因为他最疼爱的小孙子李根已经完全“是他的人了”,谁和老人顶嘴,他的“根”会立马站出来,怒斥道:“谁敢说我爷爷不好?!”

为老人选墓地时,有朋友帮忙,本可以选豪华些的,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恰巧,总编辑王立行准备外出开会来这里坐车,他听到了马上说:“你上我的车,我半道下来去开会,你们去医院接老人。”就这样,父亲第一次坐小卧车回家。当他知道,这是报社领导用的车时,一再要我谢谢人家。下次见面又问,“谢过人家了?”这就是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父亲的“记着别人的好”。
父亲是20年前带着

近日,翻翻昔日萧乾老送我的书,不禁又想起了五十多年前,我们在渤海湾边一段难忘的友谊。

1958年秋天,我们同在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萧乾是个老实人,他寡言少语,小心谨慎,唯恐出错。在劳动中他显得很吃力,一则年岁大,二则不谙农活,不时受到批评。有一回,下地割稻子,这是个累活,要手脚麻利,不停地弯腰。萧乾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跪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割稻子。

回来后,萧乾遭到队里的批判,说他“丑化了工人阶级形象”。有人大声斥责他:“地里有哪个工人像你这样干活的?”我在旁听了心里很为老萧不平。像割稻子这样的重活,本来应当让青壮年去干,你们这样派工难道是合理的吗?

久而久之,不知什么原因,萧乾成了队里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并且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干嘛要这样无端欺侮每一个老实人呢?我实在看不下去。在多数情况下,我只能默不作声。有时候批判太没有道理,我憋不住气,就鼓起勇气,替老萧说几句公道话。

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文章里,就讲了对他的一次批判。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有一次在信里附了一小包灰锰氧药粉,要萧乾在生吃果菜前用它消毒,免得生病。萧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地上,被一个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这是他“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开了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即队长)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时,农场建起了一个菜园,安排几个体

萧乾在生吃果菜前用它消毒,免得生病。萧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地上,被一个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这是他“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开了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即队长)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时,农场建起了一个菜园,安排几个体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时,农场建起了一个菜园,安排几个体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时,农场建起了一个菜园,安排几个体

弱的人去种菜。可是,菜园子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的老乡偷割一空。后来,队部在菜园里搭建了一间草房,派一个人夜间在那里值班,看守菜园子。不知怎的,队上要萧乾去干这份活。这可把老萧急坏了,他年已五旬,身体又弱,在漫漫黑夜,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里,万一遇到情况,他怎么对付得了?为此,他急得通宵睡不着觉,后来跑来找我,说他委实干不了这差事。当时我是

小组副组长,听了萧乾的诉说,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就自作主张,把老萧调换下来,另派了个年轻人去夜间值班。

这件事传到队部,领导很生气。他们说,萧乾是重点批判对象,他干活叫苦,你不但不批评他,反而护着他,这是何道理?不过,说归说,既然已成了事实,人员也就不再调整,萧乾十分高兴。

这类事以后又发生了多起,队上认为我“思想右倾”,把我这个副组长撤掉了。

1978年,萧乾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他重返文坛,充分施展他的才华,又是写作,又是翻译,一本又一本新著作不断问世。每当出一本新书,他总要寄我一本,在有些书的前页上,还写上几句很有感情的话。在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上,他写道:“季音老友:感谢你在柏各庄所给我的温暖,——在北极世界里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

萧乾后来告诉我,他写回忆录,但很少写在柏各庄农场的那些事,更不写一个曾经批斗过他的人,“都是过去的事了,整天斗来斗去的,那是什么日子呵!”老人叹了口气。

1999年2月,萧乾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4日,我在八宝山灵堂与老朋友作最后的告别。守在灵床边的夫人文洁若告诉我,萧老在病中还多次念叨我。我听了深受感动,这个憨厚老人还没有忘掉我们在“北极世界”里那段难忘的友谊。

明日刊登《梅朵远去的背影》,请关注。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山岫春放 (山水画) 卢金德

首《父亲》——
父亲是浓重乡音的絮絮叨叨,母亲去世后,儿就总能听到。于是他成了那间

等你的老屋,归来时水总开着,炉火正好。
父亲是你苦闷波段的听众,你说完困了,他却再难睡着……儿女们不曾想老人已来日无多,病倒的父亲仍是全家的依靠!

终于有一天,父亲的絮叨少了,那道目光也忽然变得很老。他多想看一眼最惦念的老三,可出差的三儿就是没有赶到……
而今,他已走得很远很远,牵挂,长留给了老屋里的遗照……

如果我是西多罗夫的旧友,是不会与这位新贵谈文学而自讨没趣的。而如今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也不用眯起眼睛摆弄表链了,他们会直视你的眼睛,炫耀自己的成功和自信。理想主义者则会像格林夫人一样,为自己的不通时务与失败而羞愧地低下头。

书店

周春梅

格林夫人用仅有的一笔小小的积蓄,在一个闭塞沉闷的小城里开了仅有的一家书店。不同的是,她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学识,却对书有着真挚的热爱。理想主义者不懂

